

致公党的中国心侨海情

陈怡霓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陈怡霓在“委员读书漫谈群”开设的“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专栏,分享交流了中国致公党作为参政党,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共同书写了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统治、建设人民国家、推进改革开放的英雄史诗,留下了中华儿女血脉相连、团结共济的动人故事。

第一件党派提案与爱国大团结

近代,背井离乡的侨胞因国家内忧外患、生计困苦而出洋谋生。他们远离祖国,深切体会到祖国积贫积弱是他们饱受歧视和排斥的根源,因此渴盼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抗日战争期间,致公党发动团结广大华侨,发扬爱国光荣传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号召,长期坚持抗战募捐活动,同祖国人民一起承担起抗日救亡的光荣任务。为了集中全力发动侨胞募捐活动,司徒美堂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专职负责纽约抗日筹款总局工作,并与在香港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取得联系,把美国侨胞的捐款送往国内。据统计,8年间,仅额捐(每人每月定额捐款15美元)一项即达1400万美元,纽约的华侨平均每人额捐800美元。从1936年到1946年,美洲20多万华侨为抗战捐款、购买公债、汇寄家用等约为4.8亿美元。

在这一时期的侨批(华侨寄往国内的汇款暨家书)中,记录了海外侨胞浓浓的爱国情怀。1931年11月,一位名为关崇初的美国华侨给弟弟写信说,要送孩子阿炳到美国政府主办的飞行学校学习驾驶技术,他希望阿炳能够“专心学习,将来得以成功回国最大用之事业也”。1937年10月,华侨刘炳良写信报告侨居地华侨踊跃捐款情况,并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华侨份子更应踊跃,缘乎素受制于人者之苛例下,实指不胜屈,岂非我国积弱之故耶!凡我侨胞,既不能前方杀敌,亦当勉输财力,誓为后盾,方不负七尺之躯也。钱财如粪土,国破家何在?”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为加强海外华侨的爱国大团结,保护华侨正当权益,保障华侨的生存与发展,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在全体会议上表示“本党因为历史关系,党员多为华侨,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共同奋斗”。司徒美堂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在大会上作题为《华侨热望新中国的出现》的发言,他说,协助政府建设好祖国,是华侨义不容辞的责任,相信“侨胞在新政府切实保障华侨正当权益号召下,一定会踊跃投资,返回祖国来”。在这次会议上,致公党还以党派名义提交了《由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实行护侨政策案》,这件提案对维护华侨的合法权益,保护华侨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开创了民主党派团体提案的先河。通过巩固与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致公党代表(从左至右):雷荣珂(田凡)、黄鼎臣、陈其尤、官文森、严希纯。

扩大华侨的爱国大团结,广大华侨加强了对祖国富强独立前途的信心,纷纷准备投资于祖国的建设工业上,更加坚信“华侨们所爱的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和华侨血肉相关,保护华侨正当权利”。(司徒美堂《与海外华侨谈爱国大团结》)

归国赤子羽球情

1951年4月,致公党四届二中全会发表《告海外华侨书》,介绍了祖国人民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号召华侨回来参加生产建设。在祖国的感召下,一批批华侨青年学生回国升学,熟练技术工人回国参加生产建设,其中就有中国致公党广州市委员会原主委傅汉洵同志。

中国羽毛球运动从蹒跚起步到瞩目于世,少不了广东羽毛球运动员的努力和贡献,少不了包括基层及小学教练在内的所有体育界人士的付出,也离不开这位毕生为羽毛球奋斗的归侨。他耕耘于广州羽坛,亲历和见证了历代羽毛球人的艰辛成长,挖掘并栽培了众多优秀的体育人才,并带出了吴迪西、关渭贞、劳玉晶、林燕芬、谢杏芳、张洁雯6位羽毛球世界冠军弟子……

傅汉洵爱上羽毛球时只有12岁,而且马上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傅汉洵的父亲傅高宾是印尼先达的侨领,自己本身也非常热爱羽毛球运动,是先达的羽协副主席。他一生有两大情结:家国情结,羽毛球情结。这些,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传承给了长子傅汉洵。

傅汉洵在17岁时就引起了印尼羽毛球协会主席的苏迪曼的注意。他直接地找到傅汉洵的父亲,表示希望召其入选印尼队。然而,傅高宾却有不同想法:如果我的儿子真有打球的天赋,也应该是为祖国争光争荣誉。他对儿子说,你回去为中国打球吧,我希望有一天,中国人能站在世界最高的领奖台上!

傅高宾的厚望,使儿子的人生一开始就背负使命,在1960年1月回国之后,傅汉洵为羽毛球事业奉献了几乎所有的时间、精力、才智和热爱。

傅汉洵回国后,同年5月就加入了广东省羽毛球队,曾两次获得全国羽毛球单打冠军,名列当时的“广东羽坛五虎将”之一,还入选国家队。他们的团队战绩也可圈可点,广东羽毛球男队多次赢得全国团体冠军,傅汉洵、侯加昌、方凯祥、黄鸿平、徐权亨等很多队员,都曾经是其中的主力,打败过到访

中国的世界冠军印尼队,向国际社会印证了实力。

20世纪70年代,傅汉洵在因伤退役后,开启了30多年耕耘羽坛的教练生涯。由于大多数羽毛球队员的年龄都偏小,最小的学员约10岁,最大的15岁左右,他从基本功抓起,并根据学员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傅汉洵在多年的积累和摸索中,形成了颇具个人风格的“广州派”羽毛球教学技法……

一年又一年,无论严寒酷暑,他都没有放松过对学员的体能训练和品质素质的塑造。傅汉洵除了是指导教练,还是体校的“补鞋匠”,球鞋破了都找他补;他还为学员理发、剪运动头;由于经费紧张,勤俭节约是必须的,他自己动手制作羽毛球和蜡烛……这还不够,三伏天,穿着破了几个洞的运动背心,汗流浹背,脚踩人力三轮车,去运冰块回来为运动员解暑、做冰镇汽水;到处托人打听营养品,购买葡萄糖为大家补充体能;每天清晨六点,用弹钢琴的手法敲门,唤醒小运动员们早起做晨练……

先后8次获得羽毛球世界冠军的谢杏芳曾经说,我在广州羽毛球队的时候,傅指导对我的教导,比我的父母还多……

傅汉洵从运动员到教练的转型,起初充满了困难挫折,但最终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幸福的转型。傅汉洵由此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父亲傅高宾的心愿:中国人,出现在世界顶级赛事的领奖台上。

牛奶厂与酱油厂

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位名叫张紫珊的美籍华人非常思念故乡中国。她的先生纪爱华是美籍犹太人,担任美国商会主席,他非常理解太太张紫珊的心情。纪爱华也希望在中国投资,于是他带着妻子到广州参观,在广州的一个傍晚,二人在街上散步,突然听见小孩子的哭声,随声望去,一位妈妈怀里抱着个皮包骨的小孩,瘦得实在可怜,于是他们就对那位妈妈说:“小孩怎么这么瘦?是饿了,你快点给小孩喂点牛奶。”那位妈妈望着这两位异乡人说:“牛奶?那可是奢侈品,这不是普通百姓可以喝的,我没奶喂小孩只能给她喝白砂糖水。”

纪爱华和张紫珊听了后非常感慨,他们没想到当时中国的物质如此短缺,国内牛奶供应困难,各类肉品还要凭票

购买,人们无法讲究食品营养均衡,饮食结构存在缺陷,小孩普遍缺钙。

在这无限感慨的时候,致公党广东省委副主委李维纲和致公党中央原常委钟杰臣遗孀杜美兰女士力荐纪爱华在广州投资,纪爱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投资一间牛场,生产牛奶,让中国的小孩喝上牛奶,提高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于是,在致公党的帮助和引荐下,纪爱华和张紫珊夫妇考察了交通、水文地理、防疫等方面的条件后,最后决定投资1560万美元在广州小新塘果园场兴建畜牧基地,这就是广州第一家中美合作企业——广美香满楼畜牧有限公司,也是我国引进的第一条现代化全封闭牛奶加工生产线。如今的香满楼已是一代人的记忆,融入了广州人生活的点滴。

时光荏苒30年。2018年,古巴共产党副总书记伊莎贝尔女士拜访了致公党广州市番禺基层委员会,恳请给予帮助。致公党广州市委、致公党番禺区基层委高度重视,落实专人负责日常联络、法律咨询、进出口业务咨询、资金筹措、宣传报道等。致公党番禺区基层委员会还向代表团捐赠了一些基本器械和部分酱油生产菌种原料,为古巴第一家酱油厂的开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让酱油厂定位准确,顺利投产,古巴驻穗总领事伊莎贝尔女士拜访了致公党广州市委,商议协助办厂建设工作。为纪念中古友谊和番禺情结,古巴谢政府负责处理发展地区倡议小组审定,酱油厂定名为“古中友好酱油厂”,酱油品牌定名为“梅山”牌(梅山是著名侨乡番禺所辖的南村镇一地名)。这是古巴目前唯一的一家酱油厂,改写了古巴没有酱油厂、酱油全部依赖进口的现状。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致公党长期致力于联结海内外华侨华人服务祖国革命建设,今后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的对外联谊工作,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以及海外侨胞的正当权益,与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互助互爱,为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讲台上的陈寅恪

张雨

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任教于清华大学。那时,每当上课铃响后,便有一位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头上戴着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棉帽,右手拎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低,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彳亍而来,这就是陈寅恪。

一位名闻天下的大学者竟被学生们称为一个“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其样子之滑稽有似于乡村的跑账先生,或旧时的书贩子。他先把要讲的内容满满地抄到两个黑板上,然后坐到讲台前的扶手椅上,开始讲课。他讲课的时候,总能营造出一种境界来,带学生穿越数千年历史、置身于汉唐时期的繁华盛世中。他的记忆特好,讲课时所引用的知识,从不翻书,张口就来,如数家珍,而且连出处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好奇的学生记下他所引用的知识,过

后专门去图书馆去查,结果千真万确,一点不差。于是,学生们送给他一个雅号“活辞书”或“活字典”。

陈寅恪先生的授课很有特点,不同于一般,讲到激动或情深处,他会长时间地紧闭双眼,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在自己所授的内容之中。他在课堂上会点名让学生朗读课文,哪怕是读错一个字,都必须停下来重读。再小的脱漏也逃不过他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长在他心里一样。

他在清华的课堂上说“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这是何等学术自信!

国学大师季羨林回忆说,听陈寅恪讲课,简直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享受。时光荏苒,岁月老去,我们永远也没有机会能听到陈寅恪先生授课了,我们只能从文献资料的记录和国学大师季羨林的回忆中,体会那种无法比拟的享受了。



李公朴“诗”为心声

周二中

李公朴是一位顽强的战士,他遇害后,毛泽东和朱德称颂他为“保卫政协争取民主而牺牲的斗士,精神不死!”周恩来称赞他“是一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献身的战士!”西南联大和昆明“哈哈合唱团”的师生与团员们为李公朴谱写了挽歌《安眠吧!勇士,民主的号手》!

李公朴早年不写诗。因为组建“救国会”、发动和领导抗日救亡斗争,他作为“七君子”之一被国民党当局关押在苏州监狱。在狱中,他偶然看到了几首陶行知先生的白话诗,感觉很有战斗力,也很有意思,于是不觉也诗兴大发,开始了白话诗歌的创作。如《羁押生活不自由·题记》等,记录了自己的处境。

1940年9月,李公朴率领抗战建国教学团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住在太行山上。一个雨夜,他联想到自己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备受鼓舞,于是挥笔写



冯友兰与联大纪念碑

王剑

1946年3月,西南联大结束历时8年的南渡办学,准备北返复校。北返前,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召集冯友兰、雷海宗、罗庸、潘光旦、汤用彤、闻一多、朱自清等人开会,说:“我们在昆明待了七八年,临走的时候总要留下一个纪念碑吧?”一时间,群情振奋,大家纷纷献计献策。冯友兰静静地听着。突然,他站起来说:“依我看,这个纪念碑不妨古典一些,干脆立一个纪念碑吧!”大家都说好。经过现场商议,此事就由提议人冯友兰负责筹备,并撰写碑文。石碑刻好之后,将立在联大食堂后面的小土山上。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纪念碑落成。当天上午,西南联大全体师生集合,召开大会。留着黑长须的冯友兰,身着长袍马褂,高声朗诵了纪念碑碑文。然后,到新校舍后面的小山上为纪念碑揭幕。

冯友兰撰写的碑文1000余字,首先点出作此碑文之因,“河山既复,日月重光”;接着追述西南联大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悲壮旅程;碑文的重点则是西南联大“可纪念者,盖有四焉”的提炼概括;最后的铭文更是画龙点睛的铿锵之笔,尤以“千秋耻,终已雪;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等句,最为精彩。

西南联大纪念碑的底座为圆拱形,高约5米,宽约2.7米,碑身嵌在其中。碑的正面刻有碑文,背面刻着从军的联大学生名单,共计834人。此碑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被称为“三绝碑”。

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赞西南联大碑的碑文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篇大文”。冯友兰也非常珍视此文,并视为其平生得意之作。30年后,他又写了一篇《联大纪念碑文自识》,对自己当年撰写的碑文大加赞赏。

既能挥笔撰文,又能坦然自夸,冯友兰的个性和襟怀由此可见一斑。



罗伯昭与《泉币》杂志

付裕

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钱币收藏家,罗伯昭不惜重金收藏罕见古钱珍品,还一直致力于钱币收藏的深入研究。1940年,他迁居上海,拒绝一切商业活动,潜心钱币研究,每周必去广东路上海古玩市场与古泉爱好者茶叙。在古泉界诸公倡议下,罗伯昭着手筹建中国泉币学社,并组织出版《泉币》杂志。

《泉币》杂志内容分为考据门、撰述门、杂著门、出品门、外埠出品门、鉴别门、通讯门等。其中,“考据门”为每期杂志第一个栏目,刊载泉友对泉币的考据、研究成果。涉及钱文释读、对泉币时代与用途的研究,以及对一些旧有学术观点正误的分析解读等。“撰述门”用于刊载较为长篇、系统性的泉友研究著述,内容多为连载,以钱谱、货币史梳理等为主。“杂著门”以序、跋、史、传和年谱、摘抄之类的文章为主,内容丰富,也有同仁创作的与泉币及泉学研究活动有关的诗作。“出品门”主要发布学社确认为真品的钱币。文章除有出品人对发布泉币的介绍之外,通常还附有泉友的补充说明及品鉴之词。该栏目文章篇幅短小精悍,

并附有大量拓片,是杂志文章最多、参与作者人数最多的栏目。“外埠出品门”为杂志第十三期开始出现的栏目。学社为鼓励社员积极参与泉学研究而开设。外埠社员凡藏有珍品,自信非贗作者,可寄来拓片至学社,并加以说明。此外,“鉴别门”栏目主要收录尚待考证的钱币,严格将真、贗分开。文章以质疑、商榷的态度,阐述一些无法辨别为真的泉币存疑之处。“通讯门”栏目内容多涉及范围较广。所刊载内容包括一些新出土钱币的消息、泉友之间的书信往来,以及与泉币学社外埠社友、与西方泉币协会交流的情况等。

《泉币》杂志从1940年7月开始,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时停刊,共出版32期。当时,《泉币》杂志的出版费用主要由罗伯昭承担。罗伯昭不仅在精力和财力上支持《泉币》的出版与发行,还为杂志撰写考据、辨伪、鉴赏、翻译文章百余篇。此外,他还将安福路7号的家作为“中国泉币学社”的活动场所,经常安排聚会。

1957年9月,罗伯昭将其收藏的15431件文物捐赠给北京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至1965年,又先后捐赠文物70余件(套)。

“值得纪念”的孙怒潮

陈扬桂

顾颉刚在1936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到,他从杭州返回北京途中,拜访南京友人的情况:“早,理好行李,即到健常家,见其父母。与之同行,乘电车到中山门外,访丁玲于苜蓿园。并晤孙怒潮及丁玲母子。”丁玲曾经回忆道:1935年,田汉在南京演出话剧《复活》《洪水》时,“与阳翰笙曾来看我,送过票子来,并有一孙姓邻居劝我观剧及为之赞助,他与田汉有来往”。丁玲的这位“孙姓邻居”就是孙怒潮。

然而,出现在著名史学家顾颉刚笔下、与著名戏剧家田汉有来往、跟着名作家丁玲做邻居的孙怒潮是何许人呢?

文史专家魏寅称孙怒潮是“我们司门前孙家垵人,是值得纪念的一位文化名人”。这个“司门前”,指的是湖南邵阳隆回县的司门前镇,是晚清著名爱国主义思想家魏源的故乡。近代以来,这里文化昌盛,人才辈出,两江

总督魏光燾、国民党总统府顾问邬鸣奇、中科院院士魏荣爵等杰出人才均出自这里。著名教育家匡亚生联合丰子恺、朱自潜等人创办了上海立达学园,是一所品位很高的名校,黎元洪和孙中山都曾为之捐款助学。该校大师云集,鲁迅、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沈雁冰、陈望道、郑振铎、胡愈之、夏衍等都曾执教于此。这些大师的立达同事中,就有两位是隆回县司门前孙家垵人士,一位是毛泽东的书法老师孙伯工,另一位便是孙怒潮。

孙怒潮少壮离家,只在1938年回过老家一次,其身世故事,家乡人知之甚少。孙怒潮一生与书为伴,先是读书,后是教书、写书、编书,其人生履历,与孙伯工如影随形。他跟孙伯工一样,大学毕业后在立达学园任教了一段时间,便抛妻别子去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他先去长春大学任教。东北沦陷后,他便去了南京、成都,1947年任

成都艺术专科学校和西南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刚组建的东北教育学院任教。

1953年,东北教育学院易名沈阳师范学院,学院师资迅速扩充,但在73名教师中,只有6名正副教授,孙怒潮名列6人之中。1933年,他撰写了《中国农村中被压迫的劳动女词人》,系统探讨了清代女诗人贺双卿其人其诗。在这部专著中,他痛斥中国正统文学史对贺双卿的忽略,指出贺双卿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用很群众化的艺术方法,表现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倾向——封建农村中的苦痛生活”。他积极投身文化抗战,一度对抗日戏剧创作产生了兴趣。他创作的四幕剧《空军魂》被编入空军戏剧丛书,1939年11月由成都中国空军出版社出版。

1942年秋天,中华全国文协主席、著名作家老舍陪冯玉祥来到成都青城山。孙怒潮闻讯后带了一个剧本上山看老舍。但因来访者太多,老舍谈兴很浓,

孙怒潮碍于年长者面子,最终没有拿出剧本向老舍请教。《文史资料选辑》第95辑中,收录有他和著名教育家、武冈师范前身——衡阳乡村师范创办人晏阳初的侄子晏升东合写的《晏阳初与平民教育》一文;中华书局出版过他与宋文翰合著的《国文法表解》。

他编了很多书,其中不少是与孙伯工合编的,如《中华学术思想选》《中华诗选》《抗战史料丛书》等等。特别是《抗战史料丛书》,系孙伯工担任黄埔军校成都分校政治部第三科科长时领衔编著的,详尽记录了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孙怒潮单独编的书,目前只有中华书局1934年版《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一套。

笔者主编过《邵阳文库·李柏荣集》,从李柏荣的文章中得知,孙怒潮对同乡先贤魏源很景仰。在南京时,他曾拜访过魏源的曾孙魏伯和,两人相约去南京打魏楼喝茶。孙怒潮问及魏源著作情况,伯和说黄兴手下叛将崔瑛抢了魏源的部分手稿。伯和请黄兴追缴,黄兴大怒,下令捉拿崔瑛,但崔瑛早已逃之夭夭,抢去的书稿未能追回。孙怒潮闻之,扼腕不已,“深以数书未及早印为憾”。